

李永祜 著

水经考论集

江
具
商
堂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李永祜
著

水 浒 考 论 集

订
具
有
是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浒考论集/李永祜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402-3763-9

I. ①水… II. ①李… III. ①《水浒》研究—文集
IV. ①I207.4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2389 号

《水浒考论集》

著 者: 李永祜

责任编辑: 夏 艳 申 妙

封面设计: 王 艺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电 话: 86-10-63555979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76 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2-3763-9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这本《水浒考论集》即将交付出版，未免有许多感慨涌上心头，写篇自序道说一番，也许是一个恰当的措施。

我自196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今称文学院）工作，几十年来在教学过程中，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其中以有关《水浒传》的居多。这种状况，可以说既与个人自身成长的历程有关，也与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有关。我生于胶东半岛西部一古老的农村，幼年夏夜乘凉、寒冬围炉之时，无所聊赖，即纠缠父叔辈讲说《三国》、《水浒》、《西游》、《聊斋》等故事消磨时光。从那时起，那些传奇英雄人物和花妖狐魅故事情节，就在我幼稚的心灵里植根和晃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响应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号召，参加本年级集体编写文学史，被分在明清文学时段；编中国小说史又在明清小说一段，执笔写《三国演义》篇章并参加《水浒传》篇章的讨论。到人大语文系工作，在教学分工时，我选择的是元明清三代，这样，对小说包括《水浒传》在内进行教学和研究就是应有之义，这可以说是必然性。但是，更多地集中于《水浒传》的研究，又有相当的偶然性。六十年代初，我在人大语文系属青年教师群体的一员，教学、科研等各方面都亟需加深学习和锻炼。当时的教研室领导冯其庸先生鼓励我们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关注社会上的学术研究动态，争取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和写文章参加有关讨论、争论，以期锻炼自己。1964年11月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的关于金圣叹等人“哭庙案”的文章，就是几个人共议的题目，而由我一人去翻检、阅读史料和独自执笔撰写而成的。1981年冬，在湖北将要举行全国性

的《水浒》学术研讨会，差不多同时在另一地方也要举行《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当时系里的科研经费不多，规定每人每年只能外出参会一次，无奈只好选择《水浒》会，心想以后再参加别的会也不为迟。不承想《水浒》会连年举办，而系里的规定依然不变，若再舍此选彼，又形同浅尝辄止，心有不甘，就这样差不多一头扎进了对《水浒》的探索和研究之中，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回想起来，也很难说清是得是失。

《水浒传》是一部杰出的古代小说。作为一个消闲欣赏者去阅读，它生动、精彩的故事情节可以使你津津有味，快意于心。但将它作为研究的对象，由于其作者、时代、版本、思想倾向等各方面的复杂性和相关史料的稀少和缺失，会使人觉得荆棘遍地，举步维艰。虽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胡适、鲁迅、郑振铎等学术前辈的《水浒》研究已为我们后人开辟了一条道路，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我们不能徘徊在前人学术成就的平台上述而不作，而那崎岖不平的道路正需要由我们自己去修整和拓宽。如果从我 1964 年撰写与《水浒传》有关的金圣叹的文章算起，涉足这一研究的领域迄今整整过了五十个年头。这五十年的历程，可以说我是从头学习，尝试研究，学习和研究不断反复、不断转化，对作品的认识也由粗浅到逐步深化的过程。八十年代初，所写的两篇关于评论《水浒传》思想倾向的文章，是针对七十年代“评水浒，批投降派”造成混乱的拨乱反正之作。由于此前若干年读书、做笔记有一定积累和思考，重新去做辨误正伪的工作，并非难以突破的羁绊。前文从各个角度论述《水浒传》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后文从作品的悲剧结局入手，剖析宋江对统治阶级效忠到底终于发生的悲剧，是《水浒传》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暴露和批判；以及此后进一步提出的罗贯中在纂修、再创作时开篇写“乱自上作”，终篇安排悲剧结局，改变了施耐庵集撰本单纯歌颂的主题，极大地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意义，提高了作品的社会认识价值等这些观点，都是经过认识上的反复才提出来的。今天看来，仍然是符合实际的，经得住了时间的考验。且前一

篇文章被筛选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九十年代末所出的《名家解读〈水浒传〉》一书之中。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看似无问题的文章中，存在着当时没意识到的疏失。就在分析《水浒传》作者主张功成身退而引用罗真人、智真长老的暗含警示、点化宋江前途堪忧，应“得意浓时，便当退步”的偈语、法言时，也引用了许贯忠、萧嘉穗两人以“雕鸟尽，良弓藏”等自古相传的政治教训劝宋江“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寻个退步”。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因为我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使用的是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水浒传全传》本，而这个版本是根据五十年代初由郑振铎先生主持以天都外臣本为底本，截取了杨定见、袁无涯百二十回本中的田王二传插入其中形成的《水浒传全传》本排印的。许、萧两人并非施、罗《水浒传》中原有的人物，而是明万历间先由简本《水浒传》初创、又经杨定见等改写扩充而出现的人物。我以此两人的话语作为体现作者施、罗思想观点引用，这是在版本上缺乏研究出现的疏失，尽管许、萧所言与施、罗的观点一致，而且此问题对全文的基本观点无多大影响。

又如，在对版本有一定的了解和看法的基础上，一方面理出了首回有无“引首（试看书林隐处）”；各回前有无入话诗词；宋江从县衙出来是先见到刘唐还是先见到闫婆；“单道梁山泊好处”开头是“山分八寨，旗列五方”还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这是区别以天都外臣本和以大涤余人本为代表的繁本两个小系统版本的四个重要标志。但由于囿于前人的成说，又未能反复思考、缜密论证，提出了此两小系统均由“郭武定本”而出的看法。实际上在十年前自己的文章中，就依据史料考证出高儒在《百川书志》著录的“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那部《忠义水浒传》远早于嘉靖初刊刻的“郭武定本”，它至迟出现于弘治初年，或许更早。而这个版本未经“郭武定”本“删去致语，独存本传”的删削，它应当是与天都外臣本同属一小系统，或许天都本就是由它而出。所以将天都本系统也认为由“郭武定”本而出，显然是不恰当的，自相矛盾的。可见版本的研究绝非无足轻重，必须狠下苦功才能在学术研究中融会贯通、

周密无误。

文本是文章、书籍的根本，这对古代典籍尤为重要。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古代长篇小说，其版本往往繁多而复杂。以《水浒传》而论，就存在成书过程由口头传说到艺人讲说，到施耐庵集撰再到罗贯中纂修、定稿成书几个阶段，此过程中有许多问题存在文本之中。施、罗原本失传，其后出现的不同回数的繁本和简本各自的系统及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篇章、文字描写等，都存在着复杂的情形和极大的差异。史料掌握不够、版本缺乏研究，甚至思考上稍有疏忽，都易造成纰漏。近代《水浒传》研究开拓者之一、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胡适，是研究大家，他就不止一次坦然承认新发现的材料“可以纠正我的假设”；^①“当时《水浒传》版本的研究还在草创时期，最重要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我都不曾见着，故我的结论不免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我假定明朝中叶有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②对《水浒传》的深入研究必须要有坚实的版本研究做基础，所得的论断才扎实可靠。我自己的教训是一例证；在当代研究者中，由于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依据不应使用的版本而得出，因而经不起检验，不堪一击的事例也不乏其人。我在此抖搂出自己的“家丑”，既是要向广大读者做出负责的交代，又是要以此警示、鞭策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要像逆水行舟那样，篙篙都不能放松用力。

由于古代小说的研究尤其是版本的研究，状况复杂，而且大多需要下考证的功夫，的确十分艰辛费力，所以许多青年学者往往望而却步。我自己年轻时也有类似的观感。其实，在任何科学研究的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都是付出莫大的精力和辛勤劳动的汗水才能换来，这个道理都是共同的。在《水浒传》版本研究领域，道路坎坷不平，问题复杂繁多，这是实在的情形。但只要不畏艰苦，勇于攀登，就能有所收获。已故范文澜先生有一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意思就是做学问要有恒心、有毅力，有定

① 胡适：《水浒传考证》，载《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

② 胡适：《水浒传后考》，同上注。

力，要耐得住寂寞；同时，还要立言有据，言之有物，绝不能徒托空言，泛泛而论。我一直把范先生的这一名言视为座右铭，时时警策和激励自己，我也从许多与《水浒传》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上，看到了这一名言显示的巨大实际效应。例如，关于宋江投降朝廷与否，在八十年代之前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双方各有史料依据，一直僵持不下。但八十年代初，美籍华人马泰来从北宋末年吏部侍郎李若水的诗文集中找到了《捕盗偶成》一诗，其中的两句“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明白无误的记述，宋江确实是投降了朝廷的。一向力主宋江未降、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的宋史权威专家也坦然承认：“宋江等人之曾经投降是确有其事的”，“把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作为一个确凿证据……乃是‘铁案如山摇不动’的一桩事实”，“我们反对宋江投降之说，是完全错误的了。”^①再如与此关联的宋江投降后有无从征方腊，也多年争论不休。九十年代初李灵年、陈新两先生从民国间《五云赵氏宗谱》和《蒙城赵氏宗谱》中发现了北宋末年名相李纲为当时的朝廷宗室、兵部尚书赵期所写的《赵忠简公言引录》关于宋江降后从征方腊的记载：“再议睦寇（指方腊——引者），则以寇贼攻寇贼，表宋江为先锋，师未旬月，贼以献俘。”此记载为第一手的史料，与宋代其他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宋江征腊一事终于得到确认。这两大争论均由确凿无疑的史料寥寥数语而定讞，它的说服力是任何单纯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分析和逻辑推论无法比拟的。几位先生发现上述史料的过程我并不了解，但我想这是他们长期关注、艰苦探求此一问题而得，绝非漫不经心地俯拾而来。

在几十年的教学、科研的生涯中，特别是退休后这十余年以来，由于时间上自由而充裕，我在《水浒传》的研究上从未吝惜自己的精力。某一专题一经确定，总是全力以赴，尤其是进入图书馆后，如饥似渴地翻阅稀见的古籍，摘录所需的资料，虽到用餐时间亦不

^① 见邓广铭：《关于宋江投降和征方腊的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四辑。

舍离开，确实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一旦发现急需的或久寻不获的重要史料，那种满足、快慰的心情绝非言语所能形容。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从事《水浒传》点校时就意识到，在从古籍中发掘新史料十分困难的今天，必须将对已有的史料的咀嚼消化和从作品本身寻找内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探索、研究，才是一条比较切实的有希望的路子。我的这一看法写进了点校前言之中。这些年来，除在别的古籍中新发现的水浒人物林冲、杨志本事的几条重要史料和一批佐证性的材料外，其他的收获都是按照上述路数得来。如由《宣和遗事》对事件的记述尤其是对晁盖等人起义地点的准确记载及堤岸、景物等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展示出的详北略南的特点，进而推断出此书为由北南迁杭州第一代艺人之作及讲说年代与《宣和遗事》成书的年代；根据对《宣和遗事》所写一系列人物（包括李师师）、地点、事件、文书（天书）等内容具有的真实性的考证，肯定了此书本身所具有的史料价值；由《水浒传》的具体描写和宋人周密的记述推测出施耐庵与施珪的父子关系及其生活的年代；由作品中的“上三卷”一语考证出施耐庵集撰本的大体卷数；由“断章句”这一特殊标识断定“武十回”中此部分应为施耐庵集撰本的原貌；由作品后半部入话诗、赋位置不当，气氛与实际描写不符及人物性格、特长与文本描写背离等，考辨出施作的原貌的轮廓，特别是进一步证实了八十年代以来所提出的罗贯中对作品开篇设置“乱自上作”、对终篇安排了悲剧结局的看法；由容与堂刻本发现的“诸名家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这一名号，找到了容与堂假托“李评本”的确凿的内证等等。以上所举之部分新发现和新看法，都是将已有史料与从作品发现的内证结合经综合研究而得出的。当然，研究《水浒传》不应只局限于作品的本身，还要与广博的“水浒文化”、与其他古代小说特别是《三国志演义》和“三国文化”等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取得局部的乃至全局性的突破。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一些进展、收获，固然是坚持不懈、孜孜不倦而得来，但所得所获实在是沧海一粟，

毫不值得自满自足；况且，能够有所进步和收获，这又与八十年代以来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朋友、同行之间的交流、切磋、质疑、争辩因而产生的相互刺激和相互推动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因欲向对方质疑、商榷和争辩而写出的。如所写《水浒》成书“嘉靖说”的两篇文章，就是对已故张国光先生观点的质疑和商榷。国光先生不但将两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全文发表，而且在后来闲聊时还郑重地表示：“在与我争论的对手中，你是得到我张国光称赞的第一人。”我想这话倒不在于称赞我文章的水平有多高，我认为主要是展示出了张先生的宽宏的学术胸襟和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又如对宋江等起义的几个关键问题特别是其进军路线问题，我只有一些不完整、不系统的初步的看法，在与朋友交流切磋中产生了分歧。面对质疑和问难，原本无意为文的想法由此转变为一定要探索、搞清的决心。经过艰苦努力，撰成长文，对几个关键问题提出了独立的见解。此文为两家重要刊物发表和转载。这种相互交流、辩难，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确是促进学术进步和繁荣的必由之路，对此我深感在心。因此，借此文集问世之际，我要向一切彼此交流、切磋、质疑和争论过的相识和不相识的学术朋友，表示深切的谢意。

两千年前的庄子说过，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这话揭示出人的生命和知识存在着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这是非常深刻的。的确，不要说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即令是《水浒传》、“水浒文化”和与此有关的其他古代小说，也卷帙浩繁，问题山积。何况从事这类研究还需要了解我国古代的政治史、思想史、农民起义史、民俗史、宗教史等各方面的历史。而一个人的生命长不过百，精力亦总有耗尽之期，不可能穷尽对所有问题的探索，并做出透彻的研究和突破。只有学术研究者代代努力，薪火相传，川流不息，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目标。有这样一个前浪带后浪、后浪推前浪的动态历程，那么对像我这年登八旬已交班、将停笔的人来说，就完全不会像庄子说的后一句话“以有涯随无涯，殆矣”那样悲观、绝

望，而是看到才人辈出、齐领风骚的兴盛局面，会欣然微笑。

这本文集收入的文章多数过去都公开发表过，少数篇章为近年所写。当时只是考虑就熟动笔或应题（会议主题）而写，在研究上并未曾有通盘考虑，所以在论题上并未照应到作品的各个方面。但此次编入文集，仍大体上按人物本事、故事流传、作者与成书时代、版本源流、思想倾向、人物形象分析、后续影响等顺序排列，以便于读者翻阅。在正编之外，另有两篇六十年代的文章和几篇影视评论、序言、会议发言和学者对《水浒传》点校本的评论等，作为附录收入。由于自己的研究水平和功力的局限，著作中肯定存在一些不足、不当之处，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在此书即将问世之际，我要深切感谢《中国社会报》周蔚华先生对本书出版的关切和帮助，贾文元先生对本书印制的鼎力支持，燕山出版社副编审夏艳和编辑申妙审稿的辛勤劳苦，王艺先生封面设计的热情相助，赵卫民同志不辞劳苦为本书打印半数以上的电子书稿。正是他们的大力关怀、支持和辛勤操劳，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特此一并志出，以表谢忱。我还要对关心、督促此事的师友也在此表示谢意。

最后，要特别感谢九十高龄的冯其庸教授为本文集题写书名。

李永祜

2014年12月10日夜

于北京世纪城寓所

目 录

自序	(1)
宋江及其起义军几个关键问题的新探考	(1)
《水浒传》人物杨志林冲本事新证	(29)
为水浒故事营造了家园沃土的一位南宋将军	(42)
《大宋宣和遗事》的史料价值及问世年代探考	(47)
施耐庵和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	(67)
《水浒传》点校本前言	(98)
《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	(119)
《京本忠义传》的断代断性与版本研究	(139)
胡宗宪与都察院本《水浒传》	(169)
太行山碗子城与《水浒传》	(177)
《水浒》中的地名证明了什么？ ——《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一	(183)
《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二	(197)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 ——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216)
《水浒传》两种伪李评本考辨	(236)
评《水浒》招安结局的思想倾向	(266)
重视《水浒》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	(280)
一部蕴涵和闪烁着古代社会大众民族精神的不朽巨著	(289)
武松——顶天立地的英雄汉	(308)
罗贯中改塑历史原型人物林冲性格的成功经验及 引发出的美学问题	(316)

《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南北文化融合	(321)
论杭州的“水浒文化”	(332)
增删不当 失神变形	
——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塑造人物形象上的	
失误及其经验教训	(339)
关于山东东平棘梁山“古宋梁王碑”问题之我见	(351)

附录一

金圣叹等人“哭庙案”真相考论	(359)
金圣叹不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	(374)

附录二

在首届全国《水浒》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384)
对一九八二年《水浒》学术年会的观感	(390)
在第二届全国《水浒》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393)
水浒探源序	(396)
瑕瑜互见 得失参半	
——李永祜教授评电视剧《水浒传》	(398)
于细微处见功力	
——《诸名家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点校本读后	(400)

宋江及其起义军几个 关键问题的新探讨

历史上的宋江及其三十六人起义军的事迹，是后世《水浒传》创作的原型人物和历史素材，因此，对《水浒传》进行研究，撇不开对宋江及其起义军事迹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出现了重大的突破。例如，长期争论不休的宋江及其起义军是否投降宋王朝的问题，宋江投降后是否出征方腊的问题，由于北宋末吏部侍郎李若水《捕盗偶成》一诗的发现^①，和北宋抗金名臣李纲的《赵忠简公言引录》的发现^②，与已有的史料相互印证，宋江投降和征方腊的问题确凿无疑，已成定谳。

但是，对宋江等起义的时间和地点；宋江起义的后期，即从离开京东南下、攻陷淮阳军到最后失败于海州的进取方向和进军路线；宋江征方腊后又遭折可存捕杀的时间和原因等这些关键性的问题，由于史料极少、相互抵牾或语焉不详，又由于研究者对史料理解的不同等复杂原因，迄今难以确定或存在异议。本文拟就以上问题作一些新的探讨。

一、宋江等起义的地点和时间

在今存的南宋多种史籍中，凡提到宋江之处，均无宋江等起义时间的记述。只是在元代脱脱编纂的《宋史·徽宗纪》中才有这样

^① 见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论历史上的宋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一辑。

^② 见李灵年、陈新：《宋江征方腊新证》，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的记述：“宣和元年……十二月甲戌，诏京东路盗贼窃发，令东、西路提刑督捕之。”从宋徽宗十二月甲戌（初二，公历为1120年1月4日）发布的这条诏令来看，所谓京东路盗贼，指的就应是宋江及其起义军；他们起义的时间当然是在十二月甲戌之前的三五个月甚至更早。这是因为，宋江起义规模很小（只有宋江三十六人）而且他不像方腊那样聚众演讲誓师，立尊号、定年号，旬日之间即聚集十万之众，很快即为官府所知。宋江等是采取了隐蔽的、秘密的方式行事，长时间不为地方官府所知，所以《宋史》称其起义是“窃发”。这是宋江起义具体时间无法确定的最主要的原因。另一重要原因是，地方官府的轻视和瞒报。宋江及其部队因为是小股“窃发”，官府得知后起初肯定认为是癣疥之疾，不足为患，同时又对上瞒忧不报。^①及至后来宋江闯州跨县事情越闹越大，不得不上报时，已经迁延了很长时间。即令如此，由于宋江起义军的规模确实很小，所以皇帝也只是下令京东西两路提刑官即省一级主管缉匪捕盗的官员进行捕捉，而未如对待方腊起义军那样，下令派大将出兵征讨。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了记录宋江起义的具体年月材料的缺失，以至依据南宋私家史籍和宋朝宫廷大量文书档案纂修《宋史》的脱脱，也只好对此一问题付之阙如，只能以皇帝发布捕捉诏令的时间“宣和元年十二月甲戌”做出交代。有鉴于此，所以近代的史学家们在论及宋江起义的时间时，或称在“宣和初年”，或称“约于本年（宣和元年）或本年以前”。^②

但是，宋江等起义的具体年份仍有探讨的余地。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有言：“礼失而求诸野。”^③这里所说的

① 瞒报事变为官吏常事，如方腊于宣和二年十月起义，当时朝廷中宦官王黼专政，“恶闻有贼且唆督浙西提点刑狱张苑勿张皇生事，因不敢实奏。”直到十二月皇帝得报后才于二十一日下令宁保军承宣使谭稹征讨。见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及《宋史·童贯传》附《方腊传》。

② 见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史类），第3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③ 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

“礼”，是指与古代儒家经典《诗》、《书》、《易》、《乐》、《春秋》并列的另一部经典《礼经》；野，指民间。此句的意思就是《礼经》如有所缺失，可以向民间的书面或口头的记载去探求。孔夫子提出的这一命题是有普遍意义的。这也就是说，民间的记载保存了不少史料可供探求，可以补官方典籍之不足。对宋江起义来说，现在就有一部传世的民间文籍可供探索研究，以补宋代史籍记载之缺失，它就是《大宋宣和遗事》。

《大宋宣和遗事》（以下简称《遗事》）被学术界公认是“宋人旧编，元人增益”之作^①，是宋代说话艺人讲史话本的一个节略本。不少史学研究者和《水浒传》研究者认为《遗事》是“小说家言”的虚构之作，没有重视考察研究书中所包含的史料。实际上，《遗事》虽是“小说家言”，但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首先，它属于说话中“讲史”这一家数（门类），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虚构。我们看到，作品对历代帝王骄奢淫逸亡国的历史只是概述，而对宋徽宗一朝，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君臣上下仍然穷奢极欲、腐败颀预的描写则稍详且与史实相合或于史有据。例如：修万岁山、运太湖石以致民不聊生、呼号于野的描述；金军攻打太原，童贯仓皇逃离的描述；金兵围困汴京，郭京召六甲神兵御敌的闹剧；太学生陈东上书皇帝要求杀蔡京等六贼以谢天下的呼声；金兵围困汴京，强索金银、子女、仪仗、图书的暴行等等，均与当时人所著之《靖康要录》、《靖康纪闻》、《靖康传信录》及其后之《东都事略》、《三朝北盟会编》、《宋史》等史籍相合。其中有些细节的记述如童贯出征方腊，宋徽宗送行，握贯手曰：“东南事尽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笔书之。”金兵将犯太原，童贯欲逃归汴京，遭太原守将张孝纯痛斥，童贯狡辩与张对骂的场面等，竟与史籍记载完全相同。^②可见《遗事》的讲史部分是摘取当时的官私史籍而来，是可信的。其次，《遗事》

^① 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有关章节。

^② 以上两处分别见《宋史·王黼传》、《宋史·童贯传》。按：《宋史》虽编纂于元代，但系据宋代各朝的实录、王偁的《东都事略》等官私史籍修撰而成。

中的水浒故事，即“梁山泊聚义本末”部分也包含可信的史料。其中除宋江得九天玄女天书、宋江率三十六将朝拜东岳还愿，朝廷无奈出榜诏谕、张叔夜前来招诱、宋江征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等这几处，或属神道虚妄，或表述含混与事实不符，或显系夸张虚构外^①，其他部分所叙之事大体上是真实可信的。

我们先看宋江等起义的规模和人员。《遗事》中主要叙述了杨志等十二指使上太行山落草；晁盖等八人上梁山泊落草；董平、索超等四人上梁山泊；宋江率朱仝、李逵等九人上梁山泊。先后共四批，每批少则四人，多者十二人，就其分散状况、人数规模和隐蔽秘密的方式而言，这正是朝廷一再宣称的盗贼“窃发”。^②关于起义的人员，除宋江之外，杨志被史籍称为“招安巨寇”，他在宣和四年春在童贯所部与辽兵作战时，与另一将领赵明，同在种师道的东路军“将选锋军”，^③而这个赵明在宋江参加征方腊时，与宋江同为刘镇的西路军裨将，受大将王涣统领^④。显然，此杨志就是宋江所部的三十六人中的真实人物。史斌（《水浒传》作史进）史籍称作“斌本宋江之党”。^⑤他在建炎元年（1127）秋重新起事称帝，次年冬兵败被杀。此史斌亦为三十六人中的真实人物。史斌或许是受招安后恢复了原名“斌”字，也有可能是改“进”为“斌”。全部三十六人的具体姓名，迄今未发现史籍中有明确的记载。但是《遗事》“梁山泊聚义本

① 节度使盛行于唐代，系总揽一州或数州军政财大权的地方将领的官名。中唐以后往往成为拥兵割据的地方军阀势力。宋代惩唐代之弊，收回节度使的兵权，只以此名号专作将相及宗室外戚的荣誉称号，并不赴任。宋江为一降寇，即使建立军功，也绝不会授此荣衔，这纯属说话人夸张虚构之言。

② 除《徽宗纪》宣和元年十二月诏令称宋江等起义为“窃发”外，在《宋会要辑稿》中有宣和三年五月皇帝的诏令，一方面批评近年一些州郡的守令不称职“以致盗贼窃发”，另一方面又对张叔夜等三名地方官“能责所部斩捕贼徒，声绩著闻，寇盗屏迹”予以嘉奖，并各晋职一等。此张叔夜就是设伏迫降宋江的海州知州。此处所说的“窃发”的盗贼，就是指宋江等人。

③ 见宋徐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转引《靖康小雅》

④ 见清徐松所辑：《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七十七册“兵十二”。

⑤ 见宋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